

晚清傳統 與 西化的爭論

孫廣德◎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晚清傳統 西化的爭論

孫廣德◎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孫廣德著．--初版．

- 臺北市：臺灣商務，1982 [民 71]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05-0901-5 (平裝)

1. 中國-歷史-晚清(1840-1911)

627.6

83003338

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

定價新臺幣一八〇元

著者 孫 廣 德

封面設計 吳 郁 婷

校對者 張樹怡 洪美淑

發行人 張 連 生

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336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三一一六一一八

傳真：(〇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 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五年十月初版第三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本人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原以先秦兩漢爲主，兼及中古，自六十三年夏，將研究重心轉至近代，而以「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爲專題之一，擬定計畫，搜集資料，撰寫初稿。其後屢經補充修正，六十九學年度奉准休假，復利用閒暇重加整理，乃暫定稿而成本書。

本書共分七章，第一章爲緒論，在說明對晚清參與傳統與西化爭論者，所應持有的態度；並對有關晚清傳統與西化的某些基本觀念，略加闡述。第二章與第四章，分別就洋務運動時期與維新運動時期爭論的重要課題，陳述當時爭論的情形。第三章與第五章，則分別就各時期爭論的情形，從各方面加以檢討。第六章，在對調和傳統與西化的「中體西用」說，加以陳述與檢討。第七章爲結論，一則對中國晚清的西化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西化，加以比較；二則探討中國文化與西化或現代化的關係；三則對中國未來的傳統與西化問題，加以瞻望。而本書的主旨與目的，要在瞭解晚清傳統與西化爭論的情形，從而觀察中西文化的衝突，尋求中西文化的調適，以探索中國文化的出路。

本書除第六章與第七章外，其餘有關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時期的主要部分，均曾分別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獎助，特此致謝。

孫廣德謹識

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洋務運動時期爭論的課題	一一
第一節	有關船砲問題的爭論	一四
第二節	有關路礦問題的爭論	二四
第三節	有關其他問題的爭論	三七
第四節	有關制度西化的倡導	四一
第三章	洋務運動時期爭論的檢討	四九
第一節	對西方器物文化與西化問題的認識	四九
第二節	倡導西化者的西化途徑	五八
第三節	雙方在中國傳統中尋得的根據	六七
第四節	倡導西化者與反對西化者的目的	八〇
第四章	維新運動時期爭論的課題	九四
第一節	器物技藝方面的爭論	九四
第二節	制度方面的爭論	一〇一

第五章 維新運動時期爭論的檢討·····	一二四
第一節 對西方器物技藝與制度的認識·····	一二四
第二節 倡導西化者的西化途徑·····	一三〇
第三節 雙方在中國傳統中尋得的根據·····	一三六
第四節 倡導西化者與反對西化者的目的·····	一四七
第六章 調和傳統與西化的中體西用說·····	一六〇
第一節 中體西用說的淵源與形成·····	一六〇
第二節 中體西用說的內容與涵義·····	一六三
第三節 中體西用說的檢討·····	一六八
第七章 結論·····	一七六
第一節 晚清中國西化與日本西化的比較·····	一七六
第二節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化或現代化的關係·····	一八四
第三節 未來的瞻望·····	一九一
參考資料·····	二〇九

第一章 緒論

依照字義，晚清當然是指清朝的晚期。而清朝於太平天國平定之後，有所謂同治中興；既稱中興，自不能算是晚期。因而所謂晚清，至早要從同治以後，也就是光緒初年算起才對。這樣以來，整個晚清便只有不到四十年的時間，似乎太短。但這只是我們從字義上所作的一種推論，事實上一般人談晚清並不從同治以後開始。近年來，學者們雖常使用晚清一詞，但很少有人注意晚清開始的時限，對近代由何時開始，倒是討論的很多，有謂宜從明清之際算起者，有謂宜從鴉片戰爭算起者（註一）。而當前一般國內外學者多採取第二說，即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的開始。至於晚清，無人為其時限畫一條清楚的界線，而在大家心目中與近代幾乎同義。因而此處所謂晚清，大體上是指從鴉片戰爭到滿清傾覆的七十年時間（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而言。

晚清是一個極其特殊而重要的時代，而其所以特殊與重要，乃因為：第一這是一個戰亂的時代。中國歷史上雖然不乏戰亂的時代，但晚清的戰亂主要係由外邦的侵入而引起，而這些外邦的國力與文明均較中國為優越，遠非歷代入侵之蠻夷可比。第二這是一個變動的時代。中國歷史上雖然不乏變動的時代，如青銅的出現、鐵的發明、封建的破壞、帝國的建立，其後的改朝換代、異族入侵等，均曾引起極大的變動；但晚清的變動却遠較歷代的變動更大、更廣、更深刻，因為晚清時代，在製造技術、生產方式、經濟結構，

以至於社會政治、思想觀念等各方面，都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第三，這是一個過渡的時代。所謂過渡，一方面是舊的已動搖而未汰除，新的已開始而未完成，新舊之間又不能彼此調和；一方面是製造技術、生產方式、經濟結構，以至於社會政治、思想觀念等的變化速度參差，幅度各異，程度不齊，不能相互調適。而且由這些意義所表現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一直延續到現在。那時代的戰亂對現在仍有影響（如國家元氣的損傷尚未恢復，民族心理的創傷尚未平復），那時代的變動現在仍在繼續（當時發生的變化，現在仍接着變下來），那時代的過渡性現在仍在延伸（仍未得調和、調適）。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裡，自然有許多重要的問題值得研究，而傳統與西化的爭論，却是一個最有意義的題目，因為：第一，它最有代表性，最能代表那個時代的中心問題。第二，它最有涵蓋性，最能包含那個時代的許多重要問題。第三，它最有貫穿性，最能把那個時代的問題從時間上與空間上貫穿起來。

首先要表明的，我們談晚清洋務運動時期傳統與西化的爭論，便應抱持一種正確的態度，就是不可對當時的人存有嘲笑輕蔑甚至怨恨之心，而應對他們作同情的瞭解，設身處地的為他們的見解尋求時代的意義。如果我們完全以現代的眼光與現代的標準去衡量他們、批判他們，那是有欠公平的。照現代的標準以現代的眼光來看，當時堅守傳統的人的確有點固陋，主張西化的人也有點膚淺；但在那個時代裡，那種情況中，那樣條件下，實在是無可厚非的。因為當時大多數士大夫的基礎人格，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形成的，大家都有一套原來的價值——態度體系，要西化，便要或多或少被迫採取一些與其原有價值——態度體系不相協調的思想或行為模式。也就是說西化根本上與其人格相衝突，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許多人堅守傳統，反對西化，那是很自然的事；有些人能突破傳統，倡導西化，已經是很可貴的了。試想，假如我們處在那

個時代裡，那種情況中，那樣條件下，我們是否一定會比他們有更好的見解呢？一般人常說晚清的洋務運動失敗了，這種論斷雖然不能說完全錯誤，但却仍然頗有值得斟酌的餘地。所謂成功或失敗，常須從比較中去判斷，並不是絕對的，中國晚清的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西化相比，當然可以說日本成功了，中國失敗了，因為日本的西化比中國的西化快速而徹底；但與當時其他國家或地區——如韓國、東南亞等的西化相比，中國的西化並不能算是失敗（註二）。就算中國晚清的洋務運動是失敗了，但失敗也不一定就是錯誤，也許仍然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

一種大的改變，尤其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整體轉變，必然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絕非三年五載的事；而且難免有許多曲折、頓挫、浪費、損失。也許我們會以為自己的見解，比洋務運動甚至維新運動時期的先輩們高明了、深刻了，但這高明深刻，未嘗不是由過去那許多曲折、頓挫、浪費、損失中所得。因而雖然當時推動西化者的成績不如理想，但我們不能否定他們的貢獻。後來西化的成績遠超乎他們之上，實在有許多是得自於他們的經驗與啟示，甚至可以說是他們西化事業的繼續發揚。西化的事業雖未在他們手中完成（從某一意義上說實在永遠不能完成），但他們已經起步，已經開始，而起步與開始每比繼續發揚困難得多。誠如柯恩（Paul A. Cohen）所說：「人們在有火車之後，不久便有了飛機，但却化了幾千年的工夫才有火車」（註三）。火車是起步與開始，飛機是繼續發揚；飛機雖比火車進步，却是得自火車的經驗與啟示。同樣的，「孫逸仙的所說所做，部分是其他人已經說過的做過的。他不能在革命的氣氛未形成之前創造一個革命，他出生時的中國（一八六六）已經蘊涵着革命了」（註四）。鄧嗣禹說清末的立憲運動，為一九一一年革命鋪路（註五）。這都意謂着中山先生之所以能發動革命，革命

之所以能夠成功，也是受在他之前倡導西化者的言行所啟發，由倡導西化者造成的需要革命的氣氛所促成。進一步說，就是中山先生所倡導的革命，也有極大的西化成分，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政治、經濟的西化活動。由此看來，晚清時代倡導西化者，的確有很大的貢獻。甚至那些堅守傳統者，雖然當時對西化的進行有所阻礙，但對我們正確認識西化的問題來說，也不能說全無幫助。

我們的題目是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開頭曾說過，所謂晚清，大體指從鴉片戰爭到清朝傾覆的七十年時間而言。在這段時間中，又可分為兩個重要的時期。第一個是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以前，可稱之謂洋務運動時期，也稱之謂自強運動時期。第二個是從甲午戰爭以後到清朝結束，以維新運動或稱變法運動為中心。至於「傳統與西化」一語，則是民國以後所喊出來的，為新文化運動時期至三十年代所慣用；晚清時代先是只言中學與西學，後來又言新學與舊學，而並未使用傳統與西化一語。不過晚清時代雖沒有傳統與西化一語，却有傳統與西化之爭的事實；因而我們雖不是談民國以後的傳統與西化問題，却仍可使用民國以後所慣用的傳統與西化一語，來稱謂晚清時代傳統與西化之爭的事實。

民國建立以後，由新文化運動以至三十年代，除了西化之外，也常使用現代化一詞；現在大家則只講現代化，而不講西化。這因為：第一，雖然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實際上是西化，但在範圍上說，現代化終與西化不同，現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而西化却不能包括現代化。第二，西化只意謂着對西方的模仿，而現代化則含有創新的意義。第三，西化是在求達到西方已有的成就，以西方為典範、為模型，因而其目標似乎是一種靜止的狀態；而現代化，則是一種不斷適應與創造的活動，所追求的不止於西方已有的成就，其目標是不斷向前移動的，是一種動態的歷程，而且所謂現代是變的，隨時而異的。柯恩的見解與我們大致相同，他

也說：「現代化最好被瞭解爲一種朝向現代狀態學習的歷程，而這種現代的狀態却永遠不能完全達到。實在沒有一種最後的現代狀態，而只有一種在許多現代與傳統力量中求適應的持續歷程」（註六）。所以講現代化比講西化要妥當得多。但是對晚清的情形而言，用西化一詞却比較恰當。因爲那時候只以西方作爲模仿的對象，而且限於西方已有的成就，很少有超出西方已有成就之外的創新觀念；洋務運動時期尤其如此。

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是由於中國與西方的接觸而引起的。因爲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顯然大不相同，彼此接觸之後，自然發生種種衝突與適應的問題，於是乃有爭論。中國文化與不同文化接觸，歷史上早有前例。譬如西晉之後，五胡侵入中原，異族的文化與中國文化相接觸，也發生衝突與適應的問題。但異族的文化皆較中國文化爲低，終於被同化消溶，問題並不嚴重。又如印度的佛教由東漢開始傳入中國（註七），與中國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思想爲中心的文化，根本不能相容，蓋儒家入世，佛教出世；儒家重視倫理，維護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等關係，佛教棄絕倫理，破壞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等關係。因此曾引起許多長時間的激烈爭論。佛教的理論極爲高深而有系統，非五胡的文化可比，就是儒家思想也有所不及，舉例來說：佛教可滿足人之超現世性的需要，可說是極高明；而儒家思想中缺乏這一層，只注重現世之安排，可說是道中庸。因而結果造成了個並存的局面，而彼此都受了些對方的影響，染上了些對方的色彩。但宗教是上層結構，佛教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思想上的，而且是偏於人生哲學方面的，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型態、社會結構等，可說根本沒有碰到。它只使中國文化發生局部的變化，而不像近代西方文化一樣，使中國文化發生根本的轉變；它只要求與中國文化取得並存的地位，並不像近代西方文化一樣，有取代中

國文化之勢。因它雖曾在中國文化中引起風潮，但不像近代西方文化一樣，給中國文化一種巨大的震撼。單就近代西方文化而言，鴉片戰爭之前，早在明末萬曆年間，已由傳教士開始引進，康熙、乾隆兩朝也不斷輸入。不過鴉片戰爭之前，西方文化的輸入是零碎的、緩慢的，中國的接受也是出於志願的，而與之接觸者，只有朝廷與少數上層人士，且所輸入者，主要是數學與天文、地輿等學，因而與中國文化不發生明顯而嚴重的衝突，雖也因為有人反對而發生爭論，但沒有形成學術界的大風潮，沒有觸及中國的經濟型態、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等，沒有形成國家社會的大問題（註八）。可是到鴉片戰爭之後，中西文化接觸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西方文化的輸入是整批的、急劇的，用船砲作後盾，以戰爭的方式，壓倒的態勢，使中國非接受不可，隨着而來的，包括西方文化的各方面，對中國朝野發生了全面的影響，不僅與中國文化有着明顯而嚴重的衝突，而且使中國文化發生了存亡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應如何應付，便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傳統與西化的爭論，可說是對西方挑戰的反應。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固然是反應，反洋務運動與反維新運動也是反應；不過前者是正面的反應，後者是反面的反應而已。就正面的反應來說，大體洋務運動時期重在採用並學習西方的物質與有形的東西，首先是船艦與槍砲，隨後是鐵路、開礦與其他科學技術等。維新運動時期進而模仿並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與教育制度等。到民國建立後的新文化運動時期以至三十年代，又認識到學習並接受西方的科學精神與人生態度。就反面的反應來說，在洋務運動時期，是不要西方的文化；在維新運動時期，雖要西方的某些文化，但要以中國的文化為主體，而且仍有許多是不要的；到民國建立後的新文化運動時期以至三十年代，是爭取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並存，而各有其範圍，各有其功

能。不過這只是大體如此說，事實上這些時期的西化是連續的，而且或多或少是重疊的，實難找出適當的界線加以畫分。

此外，我們應該知道，西化與傳統雖然相互對立，但却是彼此影響的。採取西方的技藝以至於制度與觀念的過程是很複雜的，在這複雜的過程中，許多來自西方的技藝以至制度與觀念，都被中國傳統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正。這因為西方的技藝以至制度與觀念來到中國之後，必須安置在中國的文化之中，與中國文化作動態的組合，才能夠存在，所以在從西方到中國來的過程中，必須適當地改變其性格。譬如西方設計的教育與軍事體制，要變成有中國色彩的體制；西方倡導的立憲制度，要變成有中國色彩的制度（註九）。至於中國固有的傳統，因為受了西化的影響而改變的，更為明顯，不須舉例說明。不僅如此，就是倡導西化者的主張，也受傳統的影響；堅守傳統者的主張，也受西化的影響。所謂倡導西化者的主張受傳統的影響，堅守傳統者的主張受西化的影響，從價值與方法之間最易說明；倡導西化者，仍保持中國的傳統價值；而堅守傳統者，也不能不採用西方的方法（註一〇）。也許倡導西化者與堅守傳統者自己並不覺得，但事實的確如此。因為如此，所以中國在西化的過程中，對西方事物的接受是有所選擇的，西方的技藝以至制度與觀念，並非完全受到注意，只有某些對中國文化產生衝擊的，才會在恐懼或讚美中被採取，其他的或被漠視，或根本不被知曉。而且那些被採取的技藝以至制度與觀念，在中國也並不產生與在西方相同的結果；雖然技藝的變化是平行的，但在生活方式上，尤其在態度與理想上，仍有着尖銳的不同。因此中國的西化，並不只是現代西方優越文化型態或基本理想與價值的反映，中國傳統的文化仍然大量的保留下來。總之，中國的西化，尤其是洋務運動時期的西化中，滲透了大量的傳統的影響（註一一）。

從另一方面說，中國的西化雖然學習西方，但對許多西方技藝以至制度的採行應用，却較西方更為快速。這些技藝以至制度，是由真正西方文明中產生的，因而在西方是慢慢進化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而在中國却是由於許多外來的刺激，在一種突然的、革命性的、急速而倉皇的情形下所發生，不是從中國文化中生長出來的，而是由外面搬進來的成品。因而中國能較西方更快速的採行應用西方的技藝以至制度，並不意謂着中國傳統對這些東西的阻力比西方傳統為少。事實上，較短的時距，可能正意謂着更多的傳統的殘存（註一二），是好是壞，是很難說的。除此而外，中國對西方技藝以至制度的採行應用，與其他非西方國家一樣，不僅受西方的刺激，而且受西方在前的經驗所指導，因而過程與西方國家不同，可能是較西方快速的原因之一（註一三）。不過採行與應用西方技藝以至制度的快速，並不表示中國西化的順利與澈底。因為快速的採用，並不一定快速地產生正常的效果，而且往往是恰好相反。事實上中國的西化既不快速也不澈底，在西化的過程中遭遇了許多阻礙，打了許多折扣。中國的西化之所以不順利不澈底，自然有種種的原因，而其中最特殊的一種原因，就是西方文化傳入的時機與方式。我們都知道晚清時代，西方文化是隨着武力上的勝利以強迫的方式輸入的，這對中國的西化或近代化來說，實在是很大的不幸。因為這樣一方面使中國驚懼倉皇不知所措，一方面使中國在羞辱之餘，對西方文化產生反感與憎恨；這種不正常的心理一直難以消除。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有識之士知道不得不進行西化，然而既不情願、又無通盤的計畫，固陋之士則竭力反對抵制，於是許多力量被抵消了、浪費了。

我們在本書中談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大概採取幾個重點：一是爭論的扼要敘述。二是倡導西化者與堅守傳統者，對西方器物、制度、文化及西化問題的認識。三是倡導西化者所主張的西化途徑。四是倡

導西化者與堅守傳統者在中國傳統中所尋得的根據。五是倡導西化者與堅守傳統者的目的。六是傳統與西化之間的調和言論。七是檢討晚清西化的成敗及其原因，並與日本的西化相互比較。八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化或現代化的關係，以及中國文化的出路。這些重點，均將安排在各章節中加以討論。

註 釋

- 註 一…Immanuel C. Y. Hsi,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5.
- 註 二…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台北：虹橋書店翻印，六五年四月初版，p. 149，亦有類似見解。
- 註 三…*Ibid.*, p. 6.
- 註 四…*Ibid.*
- 註 五…Ssu-Yu Te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New York, 1971, p. 196.
- 註 六…Paul A. Cohen, *op. cit.* p. 147.
- 註 七…關於佛教傳入中國之時間，眾說紛紜，然獨傳自東漢明帝時一說，持之者眾，證據較為確鑿，故暫採之。
- 註 八…參張蔭麟，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清廷之改革與反動^(上)，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七冊，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出版，五三年一月二日初版，頁一至三〇。
- 註 九…參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Charles E. Futtle Company, Tokyo, 1965, p.8.

註 | ○ · *Ibid.*

註 | | · · *Ibid*, p.9.

註 | | · · *Ibid.*

註 | 三 · *Ibid*, p.6.

第二章 洋務運動時期爭論的課題

我們在前面說過，晚清西方文化的輸入，是隨着戰爭而俱來的，也可以說是戰爭帶來了中國的西化。不過戰爭所以能帶來中國的西化，是因為中國在戰爭中打敗了，假如中國打勝了的話，洋人被趕回去，中國自然更會以天朝自居，認洋人爲野蠻之夷狄，從而對他們的一切均加以拒斥。然而事實上中國是打敗了，洋人乘戰勝的餘威，對中國極盡其敲剝侮辱之能事，這自然使老大帝國羞憤異常，但却由不得你不服氣。鴉片戰爭失敗了不服氣，英法聯軍又來一次更大的失敗，當然還是不服氣，但自己敗了，洋人勝了，這是鐵的事實。因而有識之士，便不能不尋求敵勝我敗的原因，圖謀應付的對策。敵勝我敗的原因，最直接的、最顯而易見的，便是敵人的戰艦比我們的堅固快速，敵人的槍砲比我們的威力強大，敵人的軍隊比我們的精良。那麼應付敵人的對策，便是我們也擁有與敵人同樣堅固快速的戰艦，同樣威力強大的槍砲，同樣精良的軍隊。要如此，就要跟敵人去學，這就是魏源早在鴉片戰爭後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他說：「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爲了「盡得西人之長技，爲中國之長技」，他主張：「於廣東虎門外之沙角、大角二處置造船廠一，火器局一。行取佛蘭西、彌利堅二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至澳，司造船械，並延西洋舵師，司教行船演砲之法」（註一）。